

【古籍今读精华系列】

快谈印书

陈文新 评注

潘游龙 《笑禅录》

李开先 《一笑散》

伽斯那 《百喻经》

江盈科 《雪涛谐史》

虽然都是些古代的幽默或寓言，
但原著作者的着眼点并不在此，
而是有一点人生的艺术，

一点生活的喜剧。

整理者又在注释的基础上

略加评点，空谷足音，

足以慰古人

之心而开今人之智

崇文书局

■ 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■

快谈印书

陈文新 评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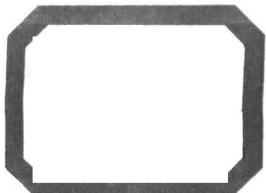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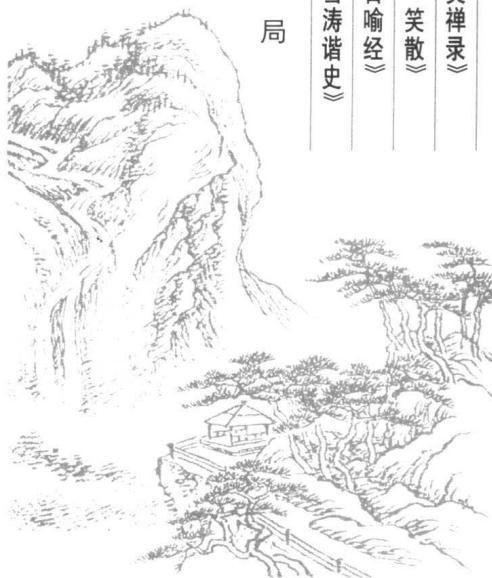
潘游龙 《笑禅录》

李开先 《一笑散》

伽斯那 《百喻经》

江盈科 《雪涛谐史》

崇文书局



(鄂)新登字 07 号

【崇文斋·古籍今读系列】

快 谈 四 书

评 注: ①陈文新
策 划: 蔡夏初
责任编辑: 舒 鹏 许举信
出版发行: 崇文书局
印 刷: 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印 张: 12.5
字 数: 360 千字
版 次: 2004 年 1 月新 1 版
印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0001 - 4000 册
定 价: 19.00 元
ISBN 7-5403-0267-4/I.50

前 言

《快谈四书》选编的四部作品，出于不同的作者之手，行文方式也互有区别，但在风格方面，却都偏于诙谐与讽刺一路。这是编者将它们汇聚一处的缘由，《前言》的话题也将由此展开。

(一)

在中国古代，讽刺、诙谐与“小说”的缘分特别深。其原因何在呢？

中国传统高度重视社会身分和等级秩序，连日常生活用语也含有社会等级的意味。比如古人尊对卑称名，卑自称也称名；对平辈或尊辈则称字或号。后来有人以为称字称号还不够尊敬，于是称官爵，称地望，像杜甫被称为杜工部，王安石被称为王临川。服饰同样是等级的象征，所以“冕旒”可用作帝王的代称，“冠盖”可用作贵人或仕宦的代称，“褐夫”可用作贫苦人的代称。在这种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儒学，也正如马克斯·韦伯对它的解释那样：“并非他物，只是一种阶级身分的伦理体系。”

重视等级和身分，人的行为必然受到严格的约束：一言一行都应与“礼”的观念一致；而“礼”是由若干非常细微的形式主义的规范组合成的。自然，

古代也屡次发生不拘礼法的情形，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记谢尚“脱帻著帽”，“酣饮于桓子野家”，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说张旭“脱帽露顶王公前”，但如此这般来表示风度洒脱，也只有在一个礼法细微的国度才可能，倘若是在今日，那就太寻常了。

尊重礼法，导致了对喜剧性因素的轻视，其承担者一向被视为低贱之辈。《汉书·枚皋传》载：“（枚）皋不能经术，诙笑类俳倡，为赋颂，好嫚戏，以故得媒糵幸。……又言为赋，乃俳，见视如倡，自悔类倡也。”又《北史·李崇传》：“（李）若性滑稽，善讽诵。数奉旨诗咏，并说外间世事可笑乐者，凡所话谈，每多会旨，帝每狎弄之。”不难看出，在帝王心目中，喜剧性因素的承担者只是高级玩物而已。

与帝王相似，古代的士大夫对诙谐也是轻视的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谐讔》虽肯定了寓谏于谐的方式：“昔齐威酣乐，而淳于说甘酒；楚襄宴集，而宋玉赋好色；意存微讽，有足观者。及优旃之讽漆城，优孟之谏葬马，并谲辞饰说，抑止昏暴。是以子长编史，列传滑稽，以其辞虽倾回，意归于正也。”但他紧接着却以几倍于此的篇幅对“谐讔”提出了批评。清初散文家邵长蘅在尺牍《与金生》中更以居高临下的口吻鄙薄明末小品文说：“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，临川滥觞，公安泛委，而倒澜于陈仲醇、王季重诸君。仆戏谓：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。广座中忽发一趣语，亦足令贵客解颐，然人品扫地矣。”

诙谐的品格既被看得如此之低，于是用以消闲的“小说”便成了它合适的栖身之地。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提醒读者：诙谐是“小说”的风格化标志之一。如《大唐新语》提要：“前有自序，后有总论一篇，称‘昔荀爽纪汉书可为鉴戒者，以为汉语，今之所记，庶嗣前修’云云，故《唐志》列之杂史类中。然其中谐讔一门，繁芜猥琐，未免自秽其书，有乖史家之体例，今退置小说家类，庶协其实。”《谈谐》提要：“所记皆俳谐嘲弄之语，

视日华所作《诗话》，尤为猥杂。然古有《笑林》诸书，今虽不尽传，而《太平广记》所引数条，体亦如此，盖小说家有此一格也。”《菽园杂记》提要：“是编乃其（明陆容）札录之文，于明代朝野故实，叙述颇详，多可与史相参证，旁及诙谐杂事，皆并列简编，盖自唐宋以来，说部之体如是也。”诸如此类，不烦引述。

（二）

幽默与老庄关系颇深。庄子说过，中国之君子，“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。”明乎礼义者，如孔丘，如墨翟，一心入世，严肃认真；知人心者，如老聃，如庄周，敝屣仁义，绝圣弃智，看穿一切，超脱世事。“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，笔锋是犀利的，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。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，在超脱派看来，只觉得好笑而已。儒家所拘执的棺椁之厚薄尺寸，守丧之期限年月，当不起庄子的一声狂笑。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，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。”（林语堂《论幽默》）受老庄呵圣骂孔的性格影响，一些“小说”家也爱与正史、正经开玩笑。比如，在历史学家的笔下，指鹿为马的赵高是一个篡乱秦国的大奸臣，然而晋王嘉《拾遗记》却将他塑造成诛除暴秦的英雄，死后尸解成仙是他作为反秦英雄的奖励。也许，从表面看，故事并不诙谐，但有意调侃正史，其内在的幽默却极富魅力。据《晋书·王嘉传》，王嘉“滑稽好语笑”，“好为譬喻，状如戏调”。他为赵高翻案，别出心裁地“戏调”流行的见解，不宜视为浅显的玩笑。与此辉映成趣，《拾遗记》还故意将古圣皇娥写成风流艳冶的恋爱女主角，也是够惊世骇俗的了。

中国古代过于严肃的东西太多，书架上的唯我独尊的“十三经”，史书中的俯瞰人世的明君、贤臣、严父、孝子，还有私塾先生的念念有词的教诲、训导，在翼道、辅道、明道的旗帜下，不

免夹带一些表面冠冕堂皇而实则虚假卑琐的东西。能够一针见血地揭示其虚妄，而笔调又没有义愤填膺的色彩，这就形成了幽默——富于睿智与含蕴的诙谐。比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九：

同年项君廷模言：昔尝馆翰林某公家，相见辄讲学。一日，其乡为外吏者，有所馈赠。某公自陈平生俭素，雅不需此。见其崖岸高峻，遂逡巡携归。某公送宾之后，徘徊厅事前，怅怅惘惘，若有所失，如是者数刻。家人请进内午餐，大遭诟怒。忽闻有数人吃吃窃笑，视之无迹，寻之声在承尘上。盖狐魅云。

作品表现了一种正真豁达、寓庄于谐的风度：有“狂”者的犀利，而无其刻薄；有“狷”者的严正，而无其小器；摒弃了世故者的圆滑，而练达过之。有嘲讽，有抨击，但全都融合在诙谐的气氛中了。

在生活被弄得过分严肃的背景下，与那些极尽伪饰或故作庄重之能事者流不同，作者既无道学气味，又无小丑气味，而是该严肃处严肃，该嘻笑处嘻笑，坦率地表露其真实面目、独特见解，其中往往就包含着令人莞尔一笑、深长思之的机智。比如苏轼写作《东坡志林》，其特色正在于推出了一个“洒然有以自适其适”、“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”的东坡，“襟期寥廓，风流辉映”，“谐谑纵浪”（明赵用贤《刻东坡先生〈志林〉小序》），诚恳谦虚。如卷一《记游松风亭》：

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，纵步松风亭下，足力疲乏，思欲就林止息，望亭宇尚在木末，意谓是如何得到？良久，忽曰：“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？”由是如挂钩之鱼，忽得解脱。若人悟此，虽兵阵相接，鼓声如雷霆，进则死敌，退则死法，当恁么时，也不妨熟歇。

随缘自适，无处不可以逍遥自在，这是苏轼的意思。其所以富于幽默感，在于他言人之所讳言。世人好说格调很高的话，听来非常美妙，大家也习以为常了，不去考察其中的乖谬；一旦明眼人

看出了真相，又能从容不迫地道出，便给人既机警又自然之感，不由得会心一笑。

(三)

以诙谐与讽刺为其基本特征的笑话文学，有着深厚的传统，悠久的历史。先秦的若干著名寓言，如“守株待兔”、“郑人买履”、“齐人有一妻一妾”等，都是出色的讽刺文字；“优孟衣冠”等与滑稽表演相联系的故事，也说明讽刺艺术很早就在社会生活中有了一席之地。

两汉以降，笑话在数量上迅速增长，除载入经史子书外，大量散见于各种笔记小说和丛谈作品中。西汉司马迁撰《史记》，特设《滑稽列传》；东汉班固的《汉书》，亦专为“滑稽之雄”东方朔立传。

三国魏邯郸淳《笑林》是我国第一部笑话集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谐讔》曾将梁以前的笑话文学的发展历史分为两个阶段。先秦为第一阶段。其特色是“意存微讽，有足观者”，“辞虽倾回，义归于正”，以诙谐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，“如优旃之讽漆城，优孟之谏葬马，并谲辞饰说，抑止昏暴。”秦汉以降为第二阶段。笑话的讽谏作用不再受到重视，作者满足于一种滑稽有趣的效果，即刘勰所谓“虽抃笑衽席，而无益时用矣”。《笑林》就属于这一时期。从“远实用而近娱乐”的角度看，它与《世说新语》等的趋向完全一致。

追求单纯的娱乐效果，《笑林》有意识地排除寓意。比如“胶柱鼓瑟”，在《史记·蔺相如列传》中只是一个比喻：“蔺相如曰：‘王以名使括，若胶柱而鼓瑟耳。括徒能读其父书传，不知应变也。’”瑟上有柱张弦，用以调节声音；柱被粘住，音调就不能变换。蔺相如用来比喻赵括死读兵书，不知变通。这就是寓

意。而邯郸淳却将它改造成了没有寓意的生活化的喜剧：“齐人就赵人学瑟，因之先调胶柱而归，三年不成一曲。齐人怪之，有从赵来者，问其意，方知向人之愚。”着眼于齐人的可笑，调侃多于抨击。情形相似的例子还有“山雉与凤凰”：在《尹文子》中，这一故事被用来说说明名、实常不相符的严肃哲理，而《笑林》则将它处理为轻松的日常笑话。

放弃了先秦诸子笑话力图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讽谏作用的社会责任感，《笑林》以机敏、谐谑、调侃为骨，而将忧虑、愤懑、谴责等较为沉重的情感因素隐藏起来或排除掉。邯郸淳通常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，没有怜悯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大喜大悲……他创作笑话旨在“缓和紧张”，旨在从理智上“举非违，显纰缪”，以博得一笑。所以，不是道德判断而是智能判断在其中起决定作用，如：“楚人居贫，读《淮南方》：‘得螳螂伺蝉自障叶，可以隐形。’遂于树下仰取叶——螳螂执叶伺蝉——以摘之，叶落树下；树下先有落叶，不能复分别，扫取数斗归，一一以叶自障，问其妻曰：‘汝见我不？’妻始时恒答言‘见’，经日乃厌倦不堪，绐云：‘不见。’嘿然大喜，赍叶入市，对面取人物，吏遂缚诣县。县官受辞，自说本末。官大笑，放而不治。”“甲与乙斗争，甲啮下乙鼻，官吏欲断之，甲称乙自啮落。吏曰：‘夫人鼻高而口低，岂能就啮之乎？’甲曰：‘他踏床子就啮之。’”在这些片断中，作者不是义愤填膺地从道德上去批判楚人的贪婪、甲的卑鄙，而是睿智、幽默地取笑他们：“瞧，多么荒谬的逻辑！多么混乱的思维！”据说，一个成人能够认识并嘲笑在孩子看来是异常巨大的兴趣和痛苦，因为这些兴趣和痛苦其实是微不足道的。而笑话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行为，正如同成人对待孩子的行为一样，他具有居高临下的优越地位。这一说法，从上面两则中可得到验证，看来邯郸淳是个蔑视世俗、经常采用幽默态度观看人生的作家。

《笑林》之后，不乏继作。隋侯白《启颜录》、唐朱揆《谐噱

录》、宋高怿《群居解颐》、宋吕居仁《轩渠录》、宋天和子《善谑录》、宋无名氏《籍川笑林》等，依循《笑林》的轨辙，新意不多，而俳谐太过，时见粗俗之言。《启颜录》等书，常用粗俗的话调谑他人，明代的一些笑话集中，还增加了以色情取笑的内容，如明冯梦龙编纂的《广笑府》卷六《风怀》的若干则。

相传为苏轼所作的《艾子杂说》是一部划时代的笑话集。全书共三十九则，由艾子（托为战国齐宣王时近臣）贯穿全书，故名为《艾子杂说》。

《艾子杂说》改变了《笑林》的“无所为而作”的宗旨，嘲讽世情，讥刺时病，与诸子笑话之注重寓意相近。如：“艾子浮于海，夜泊岛屿中，夜闻水下有人哭声，复若人言，遂听之。其言曰：‘昨日龙王有令，应水族有尾者斩。吾鼍也，故惧诛而哭；汝虾蟆无尾，何哭？’”复闻有言曰：“吾今幸无尾，但恐更理会科斗时事也。”抨击朝廷株连无度，肆意加罪，令读者想起苏轼本人在“乌台诗案”中所受的打击。其他如“鬼怕恶人”、“一蟹不如一蟹”，都含有对世态人情的辛辣讽刺。这类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作品，在诉诸理智的同时，也诉诸情感，智能判断虽仍是核心，但道德判断亦起作用。到明代，这一倾向愈益鲜明，出现了一批以“毒辣的嘲弄”来指斥现实的笑话，江进之《雪涛谐史》、《雪涛小说》，赵南星《笑赞》，陆灼《艾子后语》，冯梦龙《笑府》、《广笑府》、《古今谭概》等，政治讽刺的色彩，均相当浓重。比如，“治姬”在邯郸淳《笑林》中本是个无所寓的笑话，江进之《雪涛小说·催科》则借以批判官吏的横征暴敛；再如《笑林》中“以叶自障”的故事，赵南星《笑赞》将其改编为“隐身草”，并借题发挥道：“此人未得真隐身草耳，若真者，谁能见之。又有不用隐身草，白昼抢夺，无人敢拦阻者，此方是真法术也。”所增强的正是诉诸感情的批判丑陋的因素。

晚明士大夫常有新鲜、开明的见解，这在笑话中也常有表

现。如《笑赞》的一则：“郡人赵士杰半夜睡醒，语其妻曰：‘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，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？’其妻曰：‘男子妇人，有甚差别。’士杰遂将其妻打了一顿。至今留下俗语云：‘赵士杰，半夜起来打差别。’”故事中的赵士杰看来是个男性中心论者，生活中的许多男子在处理事情时也易于认同赵士杰的态度。但赵南星却站在男女平等的立场发表评论说：“道学家守不妄语为良知，此人夫妻半夜论心，似非妄语；然在夫则可，在妻则不可，何也？此事若问李卓吾，定有奇解。”其实，不必问李卓吾，赵南星的这则笑话自身就蕴含着惊世骇俗的奇解。读明人的笑话，一定会有出人意料的收获。

(四)

林语堂《论东西文化的幽默》曾说：“一般认为哭是一切动物共有的本能，笑却只是猿猴的特性。这种特性只有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人猿才有。我不妨补充一句，思想是人的本能，但对一个人的错误，以微微一笑置之却是神了。……我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。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，它是性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。惟有放纵的心灵，才能客观地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。”

我们奉献给读者的《快谈四书》，正是从人类的心灵开放出的幽默之花。其中弥漫着愉快与安适的气氛，潜藏着细腻而丰富的智慧，它将使您情绪疏散，神经松弛，它将如涓涓流泉带来几分精神慰藉。但愿它成为您的朋友。

幽默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。

陈文新

1997年8月6日于十八亩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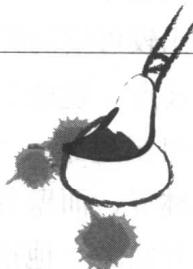
笑禅录	1
一笑散	41
百喻经	99
雪涛谐史	265



之一

笑禪錄

〔明〕潘游龍 著



朱自清 李澤厚 (整理注音)

笑禪錄導讀

(丁惟汾注 長編)

(丁惟汾注 短編)

明人潘游龍的《笑禪錄》，是一部与禅宗有关的笑话集。因此，要欣赏这部作品，不能不对禅宗有所了解。

〔1〕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为显赫的宗派之一，创始于中唐而盛行于晚唐、五代。它的形成、发展、演化及其独特个性，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异常引人注目的。

禅宗的传法世系，说来疑点颇多。

相传，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，当时大众都不晓其意，面面相觑，唯有迦叶尊者发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于是，释迦便将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的“正法眼藏”传给了他。——这，据说就是禅宗的开始。

比较可信的禅宗传法世系，当以“东土初祖”达摩为起点。达摩是南天竺人，约于南朝宋末来华。他从广州至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，然后渡江北上，入嵩山少林寺，面壁九年，默坐瞑想，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没有察觉。他把入道的途径分作“理”与“行”两种，称“二入”；又把“行人”的方法分作“报怨”（逢苦不忧）、“随缘”（苦乐随缘）、“无所求”（有求皆苦，无求即乐）、“称法”（称法而行，无心而行）四种，称“四行”。达摩的“二入四行”说，源出于《楞伽经》，给了后世禅人许多启发。禅宗因他而以“禅”名宗，尊之为“东土初祖”。二祖慧可、三祖僧璨都遵其路径。从达摩到僧璨这三代法裔相传的过程，可视为禅宗的第一个阶段。

“东山法门”代表中国禅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，其创始人为道信、弘忍。道信（580—651），俗姓司马，河内（治所在今河南沁阳）人。少年出家，承僧

璨为师。隋大业（605—618）年间，入吉州（治所在今江西吉安）传法，后至蕲州黄梅（今湖北黄梅西北）破头山传法，改山名为双峰山。弘忍（602—675），俗姓周，蕲州黄梅人，一说浔阳（今江西九江）人。七岁随道信禅师出家，受具足戒。后在黄梅双峰山以东十里的冯墓山建寺，聚徒讲习，门人甚众，号“东山法门”。

中国禅宗，从初祖达摩到三祖僧璨，其门徒都修头陀行，“一衣一钵，一坐一食”，随缘而住，并不聚徒定居于一处。至道信、弘忍时代，禅风一变。道信定居双峰山，三十余年，会众多至五百。后来弘忍移居东山，又二十余年，徒众多至七百。他们定居山林，聚徒修禅，既把运水搬柴等一切劳动当作禅的修行方式，又因此实现了生产自给。禅宗的丛林制度可说肇始于此。

道信、弘忍还完成了《楞伽经》与《般若经》、《金刚经》的融合。达摩东来，本以《楞伽经》印心，故当时慧可与僧璨皆称“楞伽师”。而道信曾劝僧俗念摩诃般若，已稍变重视《楞伽经》之风。弘忍传承道信衣钵，常劝僧俗持《金刚经》；禅宗传教改用《金刚经》就始于弘忍。他们兼收旧说与新说，倡导“即心即佛”，“心净成佛”，“息其言语，离其经论”，不立文字，顿入法界，使中国禅宗进一步老庄化、玄

学化。

弘忍门下，弟子众多，个中佼佼者有神秀、慧能、慧安、智铣等，而以慧能、神秀最为著名，开创了“南顿”、“北渐”二派。“南顿”即慧能所创的南宗禅，代表中国禅宗的第三阶段。

慧能（638—713）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。据说他本人是个不识字的和尚，起初在黄梅五祖弘忍那里做行者（没有出家而在寺院服劳役的人），在碓房舂了八个月米。后来，弘忍为了选嗣法弟子，命寺僧各作一偈。上座神秀主张渐悟，其言曰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”慧能主张顿悟，其偈曰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得到弘忍赞许，密受法衣。他得法南归，在隐居若干年后，至曹溪住宝林寺。从慧能开始，主张不要背诵佛经，而要体会佛经的旨趣；不需要累世修行，也不需要大量布施财物。只要大彻大悟，即可成佛。这些特点使禅宗鲜明地区别于隋、唐时期的其他佛教宗派，格外受中国士大夫的青睐。

唐代中叶，慧能以前，禅宗传布的地区，仅限于嵩洛湖北一带。慧能以后，禅宗蔚为显学，影响所及，由岭南、湖南、江西一带而遍布全国，并远播海外。有人以为，禅宗的正式建立，应从慧能算起；从一定的角度看，这话不无道理。至唐代后期，禅宗几乎取

代了其他佛教宗派，有时，禅学甚至被作为佛学的同义词来用。

慧能的弟子很多，《景德传灯录》及《传法正宗记》皆载有嗣法四十三人。其中尤其著名于后世的有五人，即：青原行思、南岳怀让、荷泽神会、南阳慧忠、永嘉玄觉。其后，由南岳怀让、马祖道一、百丈怀海一系分出沩山灵祐、仰山慧寂的“沩仰宗”和黄蘖希运、临济义玄的“临济宗”；临济宗经过五世的发展，又由石霜楚圆门下分出杨岐方会的“杨岐派”和黄龙慧南的“黄龙派”。由青原行思、石头希迁一系分出药山惟俨、云岩昙成、洞山良价的“曹洞宗”和天皇悟道、龙潭崇信、德山宣鉴、雪峰义存、云门文偃的“云门宗”以及天皇悟道、龙潭崇信、德山宣鉴、雪峰义存、玄沙师备、罗汉桂琛、法眼文益的“法眼宗”。“一花开五叶”，形成了禅宗的全盛时代。

上述禅宗五家，在宋代唯临济独盛，其余各宗，或归绝灭，或就衰微（但曹洞宗在宋末曾一度隆盛）。临济宗的黄龙派，数传即绝，杨岐派则恢复了临济旧称。所以临济宗后期的历史，也就是杨岐派的历史。

〔2〕禅门以不著语言、不立文字、直指本心、见性成佛为宗旨。即心即佛，一切现成。归结到一点，即对于悟的强调。